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2.008

《疾病翻译者》:文化边界上的异化和失常欲望^①

任海燕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印度裔美国作家裘帕·拉希里的多数故事具有跨界这一后现代文化和文学的新特征,其短篇小说《疾病翻译者》通过讲述发生在文化交界处的假性浪漫故事,诠释了后现代语境中异化呈现出来的新形式。生长于美国的印度裔游客达斯夫人和印度当地导游卡帕西先生均是经历了重重异化的主体,二人在“压抑的复现”以及“受媒介操控的欲望”这两种欲望模式的作用下误解了对方意图,进而产生了短暂的相互吸引。通过讽刺这种假性浪漫,拉希里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异化这种疾病。

关键词:异化;欲望;失常;《疾病翻译者》;裘帕·拉希里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2-0046-06

一 边界上的异化现象

跨界(border-crossing)是后现代文学的特征之一,作家往往通过讲述发生在不同国家或文化之间的故事,来呈现跨民族或跨文化的主题。这个“界”,有时是事实上的国界,有时仅存在于人们头脑之中,有时两者兼而有之。跨界的特征在当代印度裔美国小说家裘帕·拉希里(Jhumpa Lahiri)的作品里表现明显,自出版首部短篇小说故事集《疾病翻译者》(*Interpreter of Maladies*, 1999)起,拉希里就不断尝试以文学为载体,再现文化边界上的故事。有时,她在再现人性的温暖之余,试图探究文化交融的可能性,如《最后也是第三个大洲》的故事。但更多时候,作家着眼于当代世界的“疾病”,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荒诞问题化,通过讽喻带给人启示,《疾病翻译者》故事集的同名短篇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它以强烈的反讽对照,再现了文化边界上的失常欲望,将批评矛头直指后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异化。

“异化”是现代哲学和文学中的高频词,它高度概括了弥漫于现代世界的种种病态现象。从词

的构成来看,异化的英文 alienation 所内含的 alien 表示陌生人、异类、怪异,同时, alienation 又和动词 alienate 相关,指相对于某人、某事、某种环境变成陌生者,或变得怪异、不合常规。由是,一个人可能异化于他人、异化于群体、异化于自己的文化或其他文化、异化于工作等。马克思是现代异化最重要的阐释者之一。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他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入手,深入分析了商品生产如何使劳动者异化于自己的工作,异化于生活,并最终异化于人性。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劳动,从人那里(1)把自然界异化出去;(2)把他本身,把他自己的活动机能,把他的生命活动异化出去,从而也就把类从人那里异化出去”^①,这意味着异化令人失去成其为人的属性,失去人的本真,换言之,“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②。马克思的论断深刻揭示了现代的异化归根究底是自我异化,亦即人性的异化,而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面对异国文化和“他者”,人性异化的因和果,在后现代

① 收稿日期:2018-08-2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项目(13C560)

作者简介:任海燕(1979-),女,湖南长沙人,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研究。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社会中呈现出了新的形式。

在《疾病翻译者》中,拉希里采取以小见大的叙述策略,在跨界的语境中,讲述印度裔美国人达斯一家五口,在印度导游卡帕西的带领下,前往位于科纳拉克的太阳神庙游览的故事,以此诠释后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代文明的异化。她从日常生活、男女交往和儿童心理中挖掘深层次主题,以平实的口吻,叙述一段看似平淡无奇的旅程,展现出鲜明的女性写作特点。旅途中,卡帕西因误解了达斯夫人表现出来的好感,心中泛起涟漪,而当达斯夫人向他敞开心扉倾吐心事时,卡帕西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一厢情愿地想入非非。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

《疾病翻译者》中的边界既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存在于达斯一家——尤其是达斯夫人——和卡帕西代表的两个文化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拉希里的小说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偏爱旅行主题^①,但她已经超越了移民文学创作传统。小说中的旅行是广义上的旅行,它引出的是跨民族、跨文化的情境中的一些特殊现象,如经由异常欲望所表现的异化。达斯夫人与卡帕西之间所谓的“浪漫”,不过是建筑在误会之上的短暂性相互吸引,如果刨根究底,那是因为异化导致正常的欲望受到压抑,蛰伏在日常生活中,随着主体进入跨文化交际的语境,日常生活暂时中断,受压制的欲望以异常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一表达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达斯一家同卡帕西一家虽然都是印度裔,但国籍不同,文化和生活背景相异。拉希里再现他们的问题,并非意在关注白人主流文化对族裔文化的歧视这个常见主题,而是探讨后现代语境下异化现象的普遍性。无论是小说中出现的自我异化,还是相对于他者的异化,或是文化之间的异化,折射出的均是后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代文明的异化。从字面上看,“疾病翻译者”指的是卡帕西,因为他的一家诊所里为说古佳拉提语(印度一种地方语言)的病人做翻译,但作为标题,它意味着小说揭示的那些“疾病”需要读者对之进行解读(interpretation)。本文试图还原拉希

里小说的逻辑,从两个家庭中失常的欲望开始,探索这些欲望如何在文化边界变得“浪漫”起来,而拉希里又是如何通过讽刺这种“浪漫”,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后现代的异化现象。

二 主体的重重异化

《疾病翻译者》中最大的反讽乃是以“浪漫”邂逅的形式展现达斯夫人和卡帕西之间的误会,而造成这一误会的直接原因是主体的欲望遭受压抑和扭曲,从而导致自我异化以及家庭内的异化。王丽亚曾指出,“个人对家的渴望与失望”是拉希里笔下的一个重要主题^②。理想中的现代家庭是个体的庇护所,家庭成员通过有效沟通达成共识,尊重彼此的欲望,但达斯夫人和卡帕西却均面临着欲望困境:全职主妇达斯夫人在家中遭到丈夫的朋友性侵,生下儿子鲍比;而卡帕西则在婚后数十年,连妻子的背部都没有见过。两人在家庭中长期受到压制和扭曲的欲望,在文化的边界上爆发出来,并由此剥开了两个家庭在表面的和谐之下的重重异化。

达斯夫妻的异化首先表现在家庭认同感的缺失上。故事提到一个细节,当到达旅行目的地太阳神庙后,达斯先生忙着拍照,达斯夫人陷入沉思,不仅“数次无视丈夫提出的摆拍要求”,就连对待孩子,有时也“好像他们是陌生人一般”^③。作为全职家庭主妇,家庭本应是达斯夫人最重要的情感交流和沟通空间,她对家人尤其是孩子的漠然看起来不近情理,但却是对家庭生活极度失望的表现。在美国出生长大的达斯先生,深受父母影响,持有典型的印度式男性中心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与以卡帕西为代表的印度男性没有区别,不仅在家里十指不沾阳春水,还丝毫不体谅妻子的辛劳和因为与外界隔离,生活压力无法排遣而产生的挫败感。达斯夫人对家庭的失望在遭受性侵后达到顶点,尽管她精神上饱经折磨,丈夫却全然未察。在妻子的伤痛里,暗藏着拉希里的女性主义批判。

达斯夫妇的异化不仅表现在家庭内,还反映在对母国文明的冷漠无知上。他们以“在美国出

①云玲,郭棲庆:《蒋帕·拉希莉(同名)中的旅行书写与离散身份的建构》,《外国语文》2015年第5期。

②王丽亚:《讲故事的艺术:朱帕·拉西里及其〈疾病讲解员〉》,《外国文学》2013年第2期。

③Lahiri, Jhumpa.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99, p. 58.

生、长大”^①为荣,对于印度文化既知之甚少,又興味寥然。在旅途中,妻子表现得极不耐烦,“好像她这辈子一直在马不停蹄地旅行”^②,而丈夫的行事做派俨然是游客,他不断翻阅封面上印有“印度”二字的旅游手册,毫无感情地摄取关于当地的知识。

母国成为异国,这是当代移民中并不罕见的一种异化现象。达斯透过相机的取景框和透镜来“观看”异国,一路行来,看到猴子要拍照,看到路上行人也要拍照。相机切断了观者和被观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观察变成带有猎奇性质的窥视,这种心态不啻为异域情结(exoticism)的表现。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曾经将异域情结定义为“[因为]不了解[他者而发出]的赞美”^③,这种赞美背后是高下贵贱的“暴力的等级关系”^④,是处于高位的一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发出的赞叹,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卢梭笔下的“高贵的野蛮人”。正因为如此,异域情调只是满足了在高下等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的猎奇心理,并不能实现文化间的交流。在跨文化的语境中,达斯先生作为西方人所表现出来的异域情调已经是个问题,而他除了是美国公民,更是印度裔,他带着“异域情调”的好奇心态来窥视母国的举动,是一种双重的异化。

让人觉得尤为讽刺的是,作为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二代移民,达斯夫妇一方面同祖先的文化疏离,另一方面并未能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少数族裔的身份挑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之间的依存关系,因而他们缺乏文化认同带来的归属感,而正是这种归属感,能够通过“对某一特定身份的关注丰富人们与他人的联系的纽带,促使彼此互助,并且可帮助人们摆脱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⑤。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化异化导致了达斯夫妇的自我异化和家庭内的异化。

虽然背景相异,卡帕西夫妻间的疏离与达斯一家如出一辙。卡帕西的大儿子七岁那年因伤寒

而早夭,给妻子造成无可挽回的心理创伤。卡帕西没有想过倾听妻子的痛苦,与她一同面对,而是选择以物质方式来安慰她。讽刺的是,卡帕西为了增强物质购买力转行去儿子曾经就医的诊所当“疾病翻译者”,他的工作时刻提醒着妻子丧子之痛,夫妻间的愤懑越积越深。

卡帕西的自我异化和婚姻危机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得以凸显,而拉希里通过这种种异化,在跨文化的边界上编织出后现代的新小说。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卡帕西无需踏出国门就能近距离接触西方文化,他曾经勤奋自学各种西方语言,立志做政要的翻译,行走于文明之间,帮助解决地区和民族争端。同西方文化的接触使卡帕西意识到自身生活中对于欲望的过度压制。即使是现代印度社会,女性身体依然高度符号化,她们必须将身体包裹严实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像达斯夫人那样光着腿下车买东西,只会招来路边男性的各种轻佻回应。对女性身体的这种束缚并不局限于公共空间,在私密空间中依然存在。卡帕西结婚数十年,从未见过妻子的背部,也从未像欣赏达斯夫人的腿那样看过妻子的腿就是证明。

卡帕西是忽然意识到这种过度压抑的。拉希里将卡帕西的领悟置于太阳神庙的背景中,其讽刺寓意显而易见。太阳神庙是修建于13世纪的古代婆罗门教圣地,其外形颇似金字塔,实则是太阳神苏利耶的战车。神庙底座南北两边刻有十二对巨大的车轮,象征生命之轮,展现了生命的诞生、延续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之间的循环往复。太阳神庙一方面肯定时间流逝中的生命轮回,一方面肯定人的繁衍生存本能,其外壁刻有大量性爱浮雕。这是古印度人崇拜自然,将对两性关系的认知放置于时间和生命的背景中理解的结果。神庙所代表的古代印度人顺应天时和自然的开放态度同卡帕西的过度压抑形成鲜明对比,而神庙荒废失修,出入口早已堵塞的事实似乎意在表明,现代人忘记了先人的价值观。这些现代子孙既包括夫妻生活充满了禁忌与压抑,背离了太阳神庙

①Lahiri, Jhumpa.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99, p. 45.

②Lahiri, Jhumpa.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99, p. 47.

③Todorov, Tzvetan. *On Human Diversity: Nationalism, Racism, and Exoticism in French Thought*. Trans. Catherine Por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65.

④Derrida, Jacques. *Positions*. Trans. Alan Ba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 41.

⑤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李风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所代表的生命价值的卡帕西夫妇,也包括在太阳神庙面前近乎于文化失忆的达斯夫妻。

在文化的边界,在太阳神庙前,卡帕西和达斯夫人看似找到了彼此梦想的浪漫,实际上却各怀心事。所谓的浪漫邂逅不过是黄粱一梦,二人终究还是陌生人。英语中的 alien 和 alienation,既指陌生人,也指异化,一语双关。

三 异常欲望的两种模式

拉希里在故事中频繁使用“浪漫”一词指涉卡帕西和达斯夫人之间短暂的假性浪漫,讽刺由某种内在欲望唤起的幻觉和稍纵即逝的兴奋感。这看似“浪漫”的欲望不过是各自内心的投射,其对象并不真实,是异化了的异常欲望。二人的异常欲望虽有共性,却以两种模式呈现。

达斯夫人的欲望具有明显的病态,是典型的遭受压抑的欲望的复现。“压抑的复现”(return or recurrence of the repressed)是弗洛伊德心理学说中的重要概念,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称之为“弗洛伊德各种发现的核心”^①。与弗洛伊德对于压抑和无意识的界定相呼应,这一概念与似乎被遗忘的记忆有关,它将主体预设处于心理历史的不断变化中。暗恐(uncanny)就是一种压抑的复现。有学者曾经总结列举了它的若干特征,认为它包含了“非家和家的并存”,是“忘记状态下的‘记忆’”,近乎“一种再创造”^②。拉希里正是以之为叙事策略,再现了达斯夫人病态的压抑复现。

于达斯夫人而言,人生中最大的痛楚乃是在家中遭受性侵并产子的经历,此事因为长期受到压抑而成为一块心病,看起来似乎已被遗忘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之中。不过,在卡帕西这个陌生人的“疾病翻译者”职业的诱导下,这段家的隐痛在非家的情境中复现出来。达斯夫人表现出对卡帕西动心,可视为心病发作。彼时,后者无意间提到在诊所工作时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患者,他们以形象却不同寻常的话语倾诉身体部位的苦楚,例如,有位嗓子疼的患者说“喉咙里长着长长的草”^③,

再如,“有个年轻姑娘吐诉她的脊梁骨里有雨珠滑动的感觉”^④。这些描述虽然缺乏现代医学的精准,但却异常生动鲜活,具有强烈的陌生化效果,在达斯夫人心中引发了共鸣。

自然,达斯夫人并不是真的对卡帕西本人动心,只是他这个陌生人是她压抑复现时的“复影”(double),她从中看到了自己熟悉却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心病。于是,当卡帕西称自己的工作不过是虚度年华时,达斯夫人带着迷离的神情直说“真浪漫”。显然,拉希里在故事中反复提及浪漫,意在通过反讽提醒读者,达斯夫人眼中的浪漫非但不浪漫,还是一种病态。

对疾病翻译者职业的赞许,反映出长期受压制的心病意欲寻找渲泄口的欲望,负面情绪特征明显。而达斯夫人认为卡帕西在诊所中的责任同治病开方的医生一样重要,不断要求他多讲些病痛细节的举动更像是对待心理疾病的“谈话疗法”(talking cure),即患者通过与心理医生对谈,找出心病的症结和释放方式。达斯夫人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的心病,当她从陌生的他者口中听到各种千奇百怪的疾病描述时,获得了一种奇怪的满足感。达斯夫人选择在陌生的国度、向陌生人倾吐最为隐秘的私事,乍听起来,这一做法似乎不近情理,但细想之下,恰恰这种陌生感能带来安全感。她在陌生中感觉到的熟悉,其实是对谈话疗法的饥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卡帕西无意间充当了心理医生的角色,于是,达斯夫人对卡帕西的态度迅速由冷转热,将其视作长辈,希望从他那儿得到“类似解药的建议”^⑤。不过,无论达斯夫人对卡帕西表现出何种程度的亲近意图,从始至终,她对他毫无基于同情同理的认同,对于达斯夫人而言,卡帕西这个他者,初识时是陌生人,倾吐时是陌生人,到最后分别依然是陌生人。

尽管缺乏对他者的同理心,达斯夫人却希望获得对方的同理认同。在潜意识里,达斯夫人渴望卡帕西这个疾病翻译者对患者有同理的理解力和感受力,这样,她心中的秘密才可以向这个如心理医生一般的陌生人透露,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①Certeau, Michel de. *Heterologies: Discourse on the Other*.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 3.

^②童明:《暗恐/非家幻觉》,《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

^③Lahiri, Jhumpa.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99, p. 51.

^④Lahiri, Jhumpa.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99, p. 54.

^⑤Lahiri, Jhumpa.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99, p. 65.

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泄露。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小说结尾处,当达斯夫人寻求同理心失败后,即刻变回先前那个冷漠的陌生人。

与达斯夫人不同,卡帕西的失常欲望需要用另一种欲望理论解读,亦即何内·吉哈尔(René Girard)提出的“受媒介操控的欲望”(mediated desire)。这是一种“真实”缺席的欲望。

“受媒介操控的欲望”这个概念出自吉哈尔的专著《欺骗、欲望和小说》(*Deceit, Desire and the Novel*, 1965),是他在研究欧洲现代小说传统的基础上提出的理论。吉哈尔认为,主体和欲望客体之间有两种关联模式,一种是自然欲望模式,以直线形式表达,欲望的主客体分列直线两端,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媒介物。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就属于自然欲望。另一种是受媒介操控的欲望,以三角形的形式表达,媒介(mediator)处于三角的上方。欲望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并非简单的直接对应关系,主体的欲望受到某种媒介的挟持,欲望经由媒介投射到欲望客体。在这种模式下,欲望似乎得到了满足,但往往并不真实。就欲望的虚幻性而言,达斯夫人和卡帕西倒是相同的。

加入了媒介的欲望模型有三种同义的说法:受媒介操控的欲望(mediated desire)、三角欲望(triangular desire)或模仿的欲望(imitative desire)。文化交流领域中带有幻想的欲望大都依循这一模式,它“从本质上来说是模仿式的,某个特定榜样引导着将欲望指向某个被欲求的客体”^①。这里的“媒介”指的是“某种[概念]模式,或者说几个模式的集合”^②,它可以是流行的概念、某个传说、某个神话化的叙述、某种价值观等等。换言之,主体的欲望乃是通过模仿媒介对某个目标产生的欲望,它既不源自主体,也不直接与客体相关,而是媒介物灌输给主体的。吉哈尔以《堂·吉珂德》为例解释道,那位哭丧着脸的堂·吉珂德本来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当他视阿曼提斯为骑士的楷模,阿曼提斯代表的“骑士概念”就成为了他行侠仗义之路上的媒介。于是,堂·

吉珂德“不再选择自己的欲望对象,必须由阿曼提斯替他选择”^③,他的欲望受到了媒介的操控。

跨文化交际中产生的种种误解,常常源于对他者缺乏认知,彼此仅通过某种媒介想象对方,产生并非真实的期许,由此,人的行为远离本真,严重异化。这是全球化时代欲望受到误导后的普遍现象,是一种后现代的疾病。

在达斯夫人说出“真浪漫”之后,卡帕西的态度经历了从冷眼旁观到想入非非的变化,在脑海里构想了一出和达斯夫人的交往史,仿佛这个美国女人再度点燃了他年少时的外交抱负,令失意的生活重新扬起希望的风帆。卡帕西对达斯夫人的期待,显然是透过媒介产生的假性欲望。他对美国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源于一部曾经红遍全美的肥皂剧《达拉斯》。这部电视连续剧以德克萨斯的一个富豪家族为背景,就财富、性、权力、阴谋等各种吸引人眼球的话题大做文章,从1973年起,不间断地播出了13年,成为20世纪80年代第一部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的美国电视连续剧。《达拉斯》所代表的,是美国文化中迎合对金钱崇拜而形成的媚俗现象。对于这种文化现象,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不以为然,视之为对美国文化的讽刺。卡帕西恰恰通过这部肥皂剧来习得英语和文化,并在它的影响下构建起对美国的认知,并对剧中呈现的五光十色的权力世界向往不已。自然,卡帕西的认知非常局限,缺乏对美国真实文化的认识。正如达斯夫人误解了卡帕西的职业一般,卡帕西也误解了美国现实,误解了达斯夫人。卡帕西的这种无意识的渲泄,是自己内心的投射,与他者的真实性毫无关联,这正应了吉哈尔所言,“三角[欲望]没有任何的现实价值”^④。

两个陌生人在文化的交界处邂逅,一时产生了浪漫的幻觉,无论其背后的发生机制是压抑的复现还是受到媒介操控的欲望,再现的都是当代人的异化。故事结尾处,当卡帕西沉浸于对婚外

①Girard, René.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Trans. Patrick Greg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46.

②Girard, René. *Deceit, Desire and the Novel: Self and Other in Literary Structure*. Trans. Yvonne Freccero.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2.

③Girard, René. *Deceit, Desire and the Novel: Self and Other in Literary Structure*. Trans. Yvonne Freccero.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

④Girard, René. *Deceit, Desire and the Novel: Self and Other in Literary Structure*. Trans. Yvonne Freccero.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2.

恋的憧憬时,达斯夫人突然袒露心扉,告知鲍比并非和达斯先生所生。这番倾吐惊醒了卡帕西,幻觉顿时烟消云散,“两个陌生人分道扬镳”^①。如此结局,出乎意料,却近情近理,是拉希里的点睛之笔。

四 结语

在全球化的后现代文化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频繁地接触到他者的文化和现实,常常感觉到他者带来的冲击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说的“新奇感”^②。这一点,拉希里——这位生于英伦长于美利坚,同时又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作家——最是感同身受。她将自己定义为文化的翻译者,称“我翻译故我在”^③,正是在她的诠释或者说“翻译”下,《疾病翻译者》再现了当代跨文化交际中相当有代表性的一幕:互为他者的双方表面上在进行交流,但却没有深入了解对方的愿望。达斯一家这趟回到故国的旅行似乎毫无意义,既

未加深他们对于母国文化的理解,也没实现个人的自我成长。面对文化他者,需要的是诚恳态度,而不是小说中展现出来的病态投射之后的想入非非。假的浪漫背后不仅仅是对他者的误解,更有对他者的冷漠,而这一切,究其根源,是各种异化,尤其是自我异化的结果。

《疾病翻译者》中呈现的异化,在不同程度上都属于弗洛伊德所说的失常(perversion)。弗洛伊德认为,个体的失常根植于过往经历,折射的却是历史的问题。同弗洛伊德一样,拉希里以小见大,从有问题的家庭窥探社会的问题;同弗洛伊德一样,她将失常与欲望,尤其是性欲相连,借达斯夫人和卡帕西之间的幻想,将失常欲望背后隐藏的人性缺失呈现出来。拉希里借“疾病翻译者”完成了一个讽喻,以警示跨文化交际中的异化之疾,而作为解读当代异化之人,读者同样也是“疾病翻译者”。

Alienation and Perverted Desire at Cross-cultural Borders in Jhumpa Lahiri's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REN Hai-y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Most of the stories written by Jhumpa Lahiri, an Indian-American contemporary writer, are characterized by border-crossing, a new feature of post moder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n his short novel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Lahiri exposes and explores new forms of alienation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through the representation of a pseudo-romantic encounter at the borders between nations and cultures. Both Mrs. Daz, an Indian-American tourist, and Mr. Kapasi, the Indian tour guide, are alienated subjects. It is with their traumatized desires such as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and mediated desire that they find in each other what appears to be a romantic euphoria. Lahiri not only satires the pseudo-romance but also critiques alienation as a modern disease.

Key words: alienation; desire; perversion;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Jhumpa Lahiri

(责任校对 朱春花)

^①Tyrell, Michael. Harvard Review.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by Jhumpa Lahiri, Review by Michael Tyrell, *Harvard Review*, 1999, 17 (fall): 199.

^②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11.

^③Quoted in Shankar, Lavina Dhingra. “Not Too Spicy: Exotic Mistresses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the Fiction of Chitra Divakaruni and Jhumpa Lahiri” in Nalini Iyer and Bonnie Zare, eds. *Other Tongues: Rethinking the Language Debates in India*, New York: Rodopi, 2009, p. 37.